

国学新知文库

詹石窗 主编

徐朝旭 等著

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

儒



人民大学
出版社

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

徐朝旭 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徐朝旭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国学新知文库)

ISBN 978-7-01-012422-3

I. ①儒… II. ①徐… III. ①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②信仰-民间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②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2602号

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

RUJIA WENHUA YU MINJIAN XINYANG

徐朝旭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8月到月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635毫米×927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361千字 印数:0,001-1,500册

ISBN 978-7-01-012422-3 定价:68.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

(批准号:06BZJ015)的最终成果;

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

研究创新基地成果;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项目成果。

本书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985三期项目”资助。

《国学新知文库》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继愈 吴文俊 何乃川 汪毅夫

钟肇鹏 席泽宗 高令印 卿希泰

主 编 詹石窗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良怀 王 玫 王荣国 乐爱国

刘 钊 刘泽亮 陈鹏鸣 吴 洲

张松辉 周 宁 林观潮 胡孚琛

洪峻峰 徐朝旭 郭金彬 盖建民

傅小凡

总 序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东邻日本。这场战争震惊了中华民众，许多学人开始质疑传

统文化的经国效用，转而欣羨西方文明的强势。20世纪初，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旧”热潮中，一些仁人志士忧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问题，遂倡导整理国故，发掘国粹，如1905年2月23日创刊的《国粹学报》、章太炎创办的“国学讲习会”等均体现了此等努力方向。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设立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为国学热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2年1月，北京大学创建国学门，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国故”、“学术独立”的呼声中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根据地。其后，1925年9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诞生。这两大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延聘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为导师，汇聚文史哲的诸多一流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们办会编刊，著书立说，以维护中华学统为己任。学术先辈们的丰硕成果和弘扬民族传统的执著精神展示了一种思想境界，也为当今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提供了精神资源与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说任何一种计划都有特定文化因缘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厦门大学早期的国学研究传统乃是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的原初动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就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校长林文庆自任院长，并且敦聘久负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先生任研究院总秘书，张星烺先生、顾颉刚先生、鲁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来厦门大学之后，把国文系改称为国学系，拟以国学系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依托，把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连接起来。当时国学研究院设置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纺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

组、闽南文化研究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包括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方案等；还筹办两种刊物，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后来季刊只编好创刊号，没有出版，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创刊，实际出版三期，发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计划出版“国学研究院丛书”。可惜的是，由于校董陈嘉庚先生实业遭遇困难，经费紧缺，丛书出版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回顾历史，我每每被厦门大学早期那些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大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但也为当时“国学研究院丛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实施感到遗憾。多年来，学术先辈们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感召着我。于是，有一种愿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学术先辈的未竟之业，并且把他们的国学研究传统发扬光大。我思索着，追寻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经历了文化冬天的严寒考验之后，“国学”终于迎来了生机焕发的春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沉睡了数十年的“国学”研究重新被唤醒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神州大地的国学热潮逐渐复兴，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相继诞生。依托着这些研究机构，有关国学的研讨会、刊物、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在新国学热潮逐步形成的文化大背景下，我在惜别16年之后重新回到母校厦门大学。1998年，我开始负责哲学系“中国哲学”方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考虑最多的当然是怎样承袭和发扬沈兼士等前辈名家的国学研究传统，怎样进行学科建设的问题。从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尽管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可庆幸的是厦门大学领导给予有力支持，故而喜人的局面逐步形成。一方面，有关国学的研究机构，诸如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闽学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或者恢复加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有关国学研究的论著、丛书也陆续出版，例如《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道教医学》《儒家文化

与中国古代科技》《道韵》丛刊十二辑、《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系列丛书)、《哲学新视界》(系列丛书)等问世之后都得到了同行的好评。经过切实的努力,厦门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于2003年获得博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从而具有8个专业的博士点。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学、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也不断积蓄实力,全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20多个博士点,朝气蓬勃的学科群体与浓厚的人文氛围为新一轮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资源保证与精神支撑。

在兴趣、使命、学科建设需要的多重作用下,《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计划逐渐成形,并且见诸笔端。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陈寒节先生的来信,他询问我关于近来研究计划的一些情况,我将《国学新知文库》的主要选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经过几次电话联络和商讨,陈寒节先生告诉我可以将这套文库的出版计划提交出版社选题论证会讨论。不久之后,陈寒节先生通知我,人民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讨论通过了《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出版计划。欣喜之余,一种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敬佩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敬佩陈寒节先生的开阔眼界,感谢他的精心策划。

经过多方商讨与反复推敲之后,《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工作确立了如下宗旨:

第一,弘扬求实精神,鼓励学术创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具有求实精神,国学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就过程而言,国学研究的求实精神首先意味着对从事的领域展开广泛的调查,精读相关的经典文献,详细占有资料,然后进行深入思考,避免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中说无,而是依据事实,客观陈述,立论稳妥。这种求实精神在节奏加快的当今学术圈中尤其需要。与此相联系,《国学新知文库》也特别强调学术创新。往昔的成就固然可以引为自

豪，但重复劳动是没有前途的。唯有学术创新，才能永葆国学的旺盛生命力，焕发学术研究的青春。所谓“创新”就国学领域来说，首先是文献史料的新发现、新发掘；其次也在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选题，开展新的分析等等。古人称“天地日新”，又谓“革故鼎新”，此类格言成语说明我们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本来就非常提倡创新。在新的时代，尽管所谓“新”的标准不同，但先民们倡导创新的精神却依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在国学研究工作中认真思考和发挥。

第二，扩展文化视野，兼蓄古今中外。从研究资料来说，我们不仅要熟悉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田野信息、考古资讯以及国内前贤时仁的论著，还要有世界眼光，努力掌握国外同行的学术动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海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在文化学术传播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了解他国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就可能步他人之后尘，重复无谓的劳动，甚至陷入迷乱状态，徘徊不前；唯有高瞻远瞩，放眼全球，关注他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并且认真加以分析和借鉴，才能扬长避短，超越学术瓶颈，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关注薄弱环节，培植研究特色。经过长期的努力，国学研究在总体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往许多人谈国学，常常把它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内。其实，此等视野是相对狭窄的。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导向问题，国学研究未能在比较广阔的领域展开，故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不仅要继续关注儒家学说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而且将加强对国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的探究，比如道家、道教之学、古代科技哲理、传统经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都是以往的国学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多加鼓励。从发展的立场来看，“强势”与“薄弱”本是相对而

言的。当人们对于某个领域、某种专题不太关注而没有投入足够力量加以研究的时候，该领域或专题就是一种“薄弱环节”，而当人们对这种“薄弱环节”有了足够重视的时候，“薄弱环节”就可能转化为“强势环节”。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可以化“薄弱环节”为“强势环节”，而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培植新的特色。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精神领域而言，大多数人却依然主张文化多元化，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弘传一方文化”，既说明世界范围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也意味着文化“个性”乃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曾雄踞世界东方，其中蕴涵的精神宝藏，特别是人文资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可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术界主流倾斜于吸纳西洋、东洋文明，以追随西方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时髦，热衷于做西学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却逐渐远离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我们认为，富有情操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宽广的胸襟和视野，敢于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应该坦然地开启心扉，理直气壮地为发掘国学的积极资源而大胆探索，奉献力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已经登上国际文化舞台，正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平等对话，而且成为我国腾飞的强大精神载体，从而被西方世界所关注。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George Sarton）说：“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

到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① 萨顿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也是富有启迪的。

胡适曾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过：“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这是因为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因应了时代的需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我们希望《国学新知文库》也能切近时代脉搏，在新一轮国学春潮到来并且逐步高涨的时候推波助澜。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2006年10月10日

^① [美]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0—141页。

目 录

总 序	詹石窗 1
绪论	1
第一章 儒家天道观与民间天神信仰	58
第一节 儒家天道观与民间天神信仰的思想渊源	58
第二节 儒家天道观对民间天神信仰的影响	81
第二章 祭孔与民间信仰	101
第一节 祭孔的形成与发展	101
第二节 官方祭孔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和渗透	111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与尊孔、祭孔的转型	127
第三章 封建国家政权在儒家文化影响民间信仰中的作用	143
第一节 古代国家祀典及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与规范	144
第二节 儒教对民间信仰影响和渗透的途径	174
第四章 儒家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191
第一节 儒家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影响的缘故	191
第二节 儒家知识分子在影响民间信仰中扮演的角色	215
第五章 文学叙事方式在儒家文化影响民间信仰中的作用	258
第一节 文学叙事方式的类型与特点	258
第二节 文学叙事方式对儒家伦理影响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	282
第六章 三教合一格局下儒家文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314
第一节 儒释道的融合	314

第二节 儒释道的下移及其在民间信仰中的融合·····	335
第三节 儒释道融合对于儒家文化影响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	352
第七章 民间信仰中的儒耶对话·····	363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中儒耶对话的历史回顾·····	364
第二节 民间信仰中儒耶对话发生的原因·····	394
后 记 ·····	420

绪 论

一、儒学、儒教与儒家文化

什么是儒家文化？汉代学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的评论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司马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并把它作为儒家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标志。我们可以将以这一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形态归属于儒家文化的范畴。与儒家文化相近的概念还有儒家、儒学和儒教等，为什么本书的书名要采用“儒家文化”这个概念，而不用“儒家”、“儒学”、“儒教”或者别的概念呢？“儒家”这个概念出现在汉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儒家”下了一个定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个定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定义，它将儒家的创始人、经典、思维方式、主要思想内容和特征、思想渊源等都包括进去了。但是现代汉语的“儒家”概念有时是指一种学派，而我们的课题是要讨论两种社会意识的关系，因此没有采用“儒家”这一概念。那么，为什么不用“儒学”或“儒教”的概念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儒学、儒教和儒家文化相互间的关系。

儒学是一个比儒教更迟出现的概念，大概随着西学东渐，人们把

儒家称为一种“学派”，相应的也把儒家的思想传统和学问称为“儒学”。“儒教”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汉代末年，儒者蔡邕正式将儒教作为名词使用：“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①在南北朝时期“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但是儒教之“教”并非一定指宗教。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宗教这个名词，是个译文，有其自己的意义，不能在中文中看见一个教字的东西就认为是宗教。”^②中文的“教”字既可以指宗教，也可以指教化，又可以指学说、学术流派的意思。“教”取学说、学术流派之义，如郑玄《六艺论》中的“虑羲作十言之教。”《封氏闻见记·道教》中的“其后学道、学儒、学墨诸家，分门各为一教。”这两处的“教”字都是指学说、学术流派。《晋书》中多处出现“儒教”一词，主要也是指儒家学说或流派。“儒学”、“儒教”这两个概念在英文上是没有区分的，都用 Confucianism 这个词来表达。马克斯·韦伯写的《儒教与道教》，中文译本采用了“儒教”的译名，这个译名并不意味着马克斯·韦伯将儒家完全看成一种宗教，马克斯·韦伯将儒教与加尔文教进行比较，认为儒教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伦理资源，显然他是将儒教看成是具有某种宗教属性的文化，但是他又强调，就儒教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纯粹人世的道德伦理，他说：“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③

从儒教也可以指称儒家学说和流派的角度看，儒教可以包括儒学

① 《蔡中郎集》卷五，《司空杨公碑》。

②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引自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的含义。人们意识到必须把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儒教争论有关。任继愈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论儒教的形成》的论文，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他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经过了汉代和宋代两次大的改造，最终变成了儒教。^①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等都撰文批评任先生的观点。大多数对“儒教是教”说提出批评和质疑意见的学者不是要否认儒学的宗教性，而是不同意将儒学宗教化或将儒家学说或流派归结为宗教的观点。但是任先生从宗教的视角考察儒家文化，对于深化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牟钟鉴、何光沪撰文讨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绵延数千年的与儒学具有密切关系的宗教。牟钟鉴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一文中将此宗教命名为宗法性传统宗教，认为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心灵的精神源泉。”^②何光沪在《中国文化的根与花》一文中说：“我所谓儒教，非指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的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③牟钟鉴、何光沪所说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与道

①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引自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引自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③ 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引自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310页。